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中国文化年报/ 李军, 李俊彦编选 .—兰州: 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06.1

(年报丛书)

ISBN 7-311-02720-9

.2 李 ... 李 文化—中国—
2006—年报 . G12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389 号

2006 中国文化年报

李 军 李俊彦 编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 8912613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8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03 千字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 - 311 - 02720 - 9 Z · 69

定价: 28.00 元



导论 :当代中国文化的责任与梦想

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胡锦涛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责任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锦涛同志的讲话，指明了文化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明确了文化工作的责任。文化界应认真领会讲话的精神，科学地分析文化的现状和趋势，深入地研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撑。

（一）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创造了惟一可以与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态相比美的文化，从而最终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文化是一定历史、一定地域、一定人类种群生存状态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文化和人互为创造对象。文化的表现和接受、鉴赏和消费的主体都是人自身，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能动作用，也是通过对人的影响来实现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其实，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文化绵延不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建设文化当然应从具体做起，但观察文化，只有从整体上才能看清其完整而真实的面貌。文化的基本要素，可分为知识、情感、伦理、信仰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形成一个开放的、相对独立的、连续发展着的体系。从文化结构体系的四个层面来观察，新时期中国文化正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孕育着新的发展和更新。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给认知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给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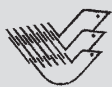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平衡,从而为新时期文化的发展更新,创造了必要和可能。信息、知识层面是文化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反映,它对文化的发展乃至性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知识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状态,这极大拓宽了人们认知的领域,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信息技术不仅创造了强大的传输系统,也催生出某些全新的文化样式。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本就十分混乱的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复杂。目前,社会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出现的种种变化和问题,与我国信息社会的初始状态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增长新的智慧和能力。信息是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但是,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也不等于能力。信息,只有通过有效的接收、辨识、整合,才有可能成为知识,从而真正进入文化过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和能力则需要通过人的实践和总结、体验和领悟方可获得。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浪潮,带来了新奇,也带来了某些迷茫。关于网吧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问题便是突出一例。“远离游戏机!”的呼吁言犹在耳,“远离网吧!”的呼声更加强烈。人们有理由对信息时代带来的种种消极现象表示担忧,但人们无法拒绝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正在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加快普及网络知识和技术。未来终究属于青少年,信心是一切关爱的前提。我们在防御和消除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应积极鼓励和引导青少年,增长知识,增长智慧,努力提高应对信息时代种种挑战的能力。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对于文化建设来说,信息化给我们以重要启示:科技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造福人类的科技亦可能贻害人类自身;信息化不仅是技术,而是一种正在普及的生活方式,它对于文化发展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日益显现。文化的发展,从内容、形式到手段,都不能不考虑信息化以及整个科技发展的因素;信息化、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化管理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机制。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迅捷变化的时代,新科技、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利益与弊端交织,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特别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维,需要有面向未来的前瞻



性谋划,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引领潮流的进取精神。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增强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激烈的竞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使人们的情感世界产生某些躁动和不安。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着文化的人文关怀。文化体系中的情感层面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感性的价值判断与反映,它的符号形式是文学艺术。情感对伦理、信仰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转型和大的变革时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旗帜,对于社会有着重要引领和凝聚作用。文学艺术对于人们心理抚慰和精神激励的功能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正在从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一些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处于调整之中,人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人在饥饿时,只有一种烦恼,吃饱以后,便会产生出无数的烦恼”,前者是生存的烦恼,后者是发展的烦恼。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在不断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理想的境界,而人自身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着全面发展和不断完善。这是文学艺术备受需要并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时期。

生机勃勃的中国社会,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充沛的源泉。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日趋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人们也明显地感到,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繁荣中显得庞杂,发展中有点浮躁。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相比,文学艺术的现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文化现象固然复杂,但对于现实生活的隔膜,对于普通百姓情感的疏远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忽缺,不能不说是当前一些作品缺乏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当前文化反思中,邓小平二十年前语重心长的教诲,再次震撼我们的心灵。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感受时代脉搏,体察民意人心,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才有可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给奋斗着的人民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慰藉,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精神文明得到重视,思想道德观念适应时代发展,在不断进步,但伦理道德层面的文化失根、传统断层现象依然严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德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伦理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规范,它的实质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约束和调节。这种约束和调节主要通过法律和道德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学最为发达。传统伦理通过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梳理、归纳,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基本观念,并且以十分完备的礼仪、规范来保证,同时,通过文化的载体,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渗透,代代传承。目前,关于道德教育的研讨很热烈,总感觉现代道德教育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固然复杂,其中,忽视传承、忽视文化载体、教育形式单一,以及频繁变动的“要求”太多,持之以恒的“规范”太少,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文化体系,它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同时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善良、正义及表达方式。其优良传统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新意。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无数母亲,其中包括一字不识的劳动妇女,毅然送子参战,当她们以“忠孝不能两全”相勉时,人们感受到的是绝无丝毫的封建道德,而是一种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民族大义。对于民族的伦理道德,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批判继承,而以往的文化批判,往往缺乏科学的分析而失之偏颇。长期以来,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传统的批判,达到全面摧毁的程度。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步入开放的时代,步入市场经济的环境。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导致当前伦理道德方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传统犹如血脉,应该更新,但不可以割断。党的十六大在论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时,强调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真是切中要害,振聋发聩。十六大后,党中央颁布实施了全民道德教育纲要,思想道德教育普遍加强。此项工作,关乎民族未来,绝非权宜之计,任重道远,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坚定了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但全民族价值体系的重建,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信仰,包括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价值观一系列基本概念,在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与其他要素构成复杂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以及精神文化领域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对社会各种思想文化实行有效的整合、凝聚和引导。信仰及其价值观是人的精神支柱。我们曾经把理想与现实、信仰和政



策混为一谈,犯过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毛病。我们党纠正了错误,把迈向遥远目标脚步放在了现实的土地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坚定了人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时,应该看到,理想、信仰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的重建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内心有进步的价值观的支撑,远处有科学的理想之光的照耀,现实生活才变得有意义。人需要现实的鼓舞,同时又执著于终极关怀。这就是文化的使命。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伟大工程正在实施,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加强。但从实际工作来看,这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如何把理想与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抓好以科学信仰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科学信仰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有机联系,从而实现信仰与现实的互动,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结合;包括科学信仰如何与大众的人生及常人、常理、常情相融合,真正成为多数人的追求和精神寄托;也包括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以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等等,均需要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要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渗透到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素质的提高、科学信仰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文化过程,需要立足现实,面向长远,坚持不懈,方能奏效。

(二)

中国先进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主流文化形态,它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人民展示了光明幸福的现实前景,也为通向美好社会最高理想指明了现实的途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方向是以明确的目标为前提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文化建设的社会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是文化建设的育人目标。这两个目标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文化的社会目标和育人目标,科学地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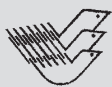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全面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世界的和平,是党在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和激励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以此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广泛地展开,深入地推进。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身心的和谐,一直是人类的憧憬。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对抗作了最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进步趋势的充分信念。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它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一经提出,便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并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和谐是以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其前提的。和谐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党中央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和工作重点,也为实现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指明了现实的途径。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和各方面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文化建设应该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造福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伟大历程,也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和顽强奋斗的历程。中国先进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伟大旗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对人们思想的引领和启迪作用、对人们精神的抚慰和激励作用、对社会矛盾的疏导和缓解作用、对全民族的亲和与凝聚作用。

文化要承担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责任,必须坚持重在建设,努力推进文化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党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是研究当代



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依据。本世纪的头20年,对于我国来说,是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党中央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形势和国家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第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承上启下的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二,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三,这一发展阶段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又充满挑战,存在着诸多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和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第四,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实现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统一,是胜利完成这一阶段历史任务的战略抉择。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根本目的。强调文化重在建设,符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也是鉴于历史上重于批判,疏于建设的教训。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强调重在建设,有利于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规划和实施,全面推进文化的思想理论建设、法规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业务建设。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强调重在建设,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参与文化建设的实践,也有利于启发、激励社会成员从我做起,增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

文化创新,核心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促进文化思想的与时俱进,关键是文化体制及机制的创新,主体是文化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十六大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并明确提出构建文化创新体系的重要任务。

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文化创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新的积累和结晶,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不断创新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包括几千年来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爱国、科学、民主的传统和党领导下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创新的坚实根基。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文化赖以生长、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化,当代文化只有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

文化创新的核心,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扎根民族的土壤,面向现代化的实际,在文化思想方面坚持与时俱进。文化体制的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党中央领导下,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通过试点,目前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这就是以繁荣为中心,通过改革,促进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改革的重点是,革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文化思想和文化体制的创新,将会有力地促进文化内容、形式、手段的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是十六大确定的重要任务。认真总结前一段的改革实践,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现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文化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文化安全问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文化安全包括在文化发展战略之中。国家安全,归根到底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文化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我们应该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心。信心源自历史,更源于现实。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根基,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和挫折,始终未曾中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熔铸力和生命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充满活力,人民满怀信心。实践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地把握我们的发展目标,坚持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是确保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的根本之策。

同时,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竞争,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这种竞争大量是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中进行;二是文化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目前,我国上网用户已逾亿户,可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极其有限,文化贸易也存在较大的逆差。应大力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应特别重视以网络软



件为重点的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抢占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制高点。应注重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品牌和市场竞争力文化集团,扩大我国文化产品的市场份额。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以堂堂正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坦诚地面对世界,争取更加广泛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国家关系,独立是基础,平等是前提。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应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博采众长,同时要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熔铸万物,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对于弘扬先进文化,提倡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杜绝反动腐朽文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坚持依法管理。我们信守有关的国际承诺,同时,对于违反我国法律的反动、腐朽文化,坚决予以抵制。要坚持不懈地打击盗版、走私犯罪活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创造力。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文化。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孙家正.光明日报,2005.8.5)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文明的话题

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新现象。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主导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对这种广义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研究,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比如卡尔·马克思就关注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



探索,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对我们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对此,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种种反应。我本人近年来对“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评论,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

时代的呼唤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潮,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世界上极端主义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种种事端,依然摆脱不掉“以我为中心”的影子。

因此,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要认真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必然会碰到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会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探讨文化交流时,常会牵扯到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在对各种文明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也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人类学者对文化、传统的理解,社会学对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民族学对族群性的解释等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某种结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研究问题时,要把眼光放开、放远一些,思路变得灵活、广泛一些,不要总局限在一些常识性的、常规性的和褊狭的框框里。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

人类每逢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做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果,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y)

研究文化和文明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长补短。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在对全球化和文化、文明的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体会。

我的学术生涯,大约是70年前从广西大瑶山开始的,那次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的方法)对我一生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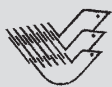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在关注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如何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现象和现象,都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绝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像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你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这种心态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关键。深入到“异文化”中去做调查,努力了解“他人”的语言、传统,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

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路。当我70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每年仍然要安排1/3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

心态和价值观

从学术史上说,这种实地考察的实证主义,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上世纪初提出的。1914年至1918年间,马老师通过在西太平洋Trobriand岛上参与和观察当地土人的生活,从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基础。他的这一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人文价值上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把殖民地上的人民看成是和



白人性质上不同“未开化”的“野蛮人”。马老师却号召人类学者到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够为“人”的原始社会里去参与、观察和体验那里人的生活。马老师使这些“化外之民”恢复了做人的地位和尊严。

在马老师强调和提倡田野工作之前,即使像弗雷泽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在搞研究工作时,也主要是依靠查阅各种游记、笔记、文献资料。这种大量利用间接观察、间接记录、多手转达的方法,很容易因为观察者视角不一致、信息不连续和不完整,使研究者做出错误的解释和结论。实地调查能够促使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参与观察”,使“人类学走出书斋”,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

要进行跨文化的观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我特别提到一个“悟”字,这个字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当中,乃至他们的思想中,能设身处地地像他们一样思考;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能冷静、超然地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心态下,去真正体验我们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我认为,在讨论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技术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还是研究者的心态。

其实,我们平时常说的“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这句话,就很通俗地说出了在跨文化研究时所持有的心态。这句话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类似的“原则”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还有很多。我想这些“原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融汇百川,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而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或许能够对我们社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培养这种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心态,是提高每个社会工作者人文修养的一门必修课,应该把这方面素质的提高,作为对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如果再扩大一些,我们能在一般民众中也推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其结果,必然能够增进不同文明中普通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交流和理解。如果这种沟通、交流和理解能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今天世界上诸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偏见、冲突以及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等等就有了化解和消除的希望。



交融中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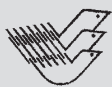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林诺斯基这样的,对西方文化中自斡中心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反制的学术流派。这种反思,可以说就是“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然而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中各种势力和学术界各派别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较量。从另一方面看,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磨炼后,其社会成员思想和心理都起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思潮。这个状况,被一些人称作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局势。目前所谓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

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传播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然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化快速传播的同时,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上的交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些被吸收的“异文化”,经过“消化”、“改造”之后,成了各自文明中新的、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可以说,今天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之世界文明,已非昔日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启迪

作为非西方文明主要代表之一的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压,为了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捍卫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长期的遭受屈辱,不断的奋起抗争,如今昂首屹立在世界上的经历,对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时的心态,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

“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



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总结了多年来研究的心得,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试图阐明中华民族这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实体形成的过程。

在我们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做是一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比如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古代中国这种分散的多中心的局面,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内在机制、怎样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才得以存在?这样“和而不同”的局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要素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问题。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所以,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比如早在公元前,号称“诸子百家”的战国时期,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创立了那么多学说,后来为什么会“独尊儒术”,能够“统一”?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有,许许多多的族群在融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时,是以一个怎样的机制,使原本属于某一族群的文化,发展成由大家“共享”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怎样“友好共处”,是一个比较复杂、棘手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成功解决的范例。比如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观念非常强烈的群体,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传统文化氛围